

王明蓀主編

#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編 第三五冊

##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

——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史學的分析

楊志遠著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編

王明蓀主編

第35冊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  
——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史學的分析

楊志遠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史學的分析／楊志遠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190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編：第 35 冊)

ISBN：978-986-254-255-2 (精裝)

1. 近代史 2. 中國史 3. 史學評論

627.6

99013229

ISBN - 978-986-254-255-2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 編 第三五冊

ISBN：978-986-254-255-2

##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 ——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史學的分析

作 者 楊志遠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35 冊 (精裝) 新台幣 5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  
——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史學的分析

楊志遠 著

## 作者簡介

楊志遠，1965年生於臺灣高雄，東海大學歷史系所學士、碩士，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教於吳鳳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幼承庭訓，性好文史，及其漸長，始知學海無涯，於是歸返史學，並經業師呂士朋、杜維運先生指導完成碩士論文《章實齋史學思想之研究》，其後入伍服役於海軍陸戰隊。退役後，師事中正雷家驥先生攻讀史學史專業，以《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演變——關於儒化、進化、實證化史學的分析》取得博士學位。近年學術研究多集中在史學史與學術思想史方面，已發表學術論文：〈章學誠的史論及其影響〉、〈蘭克的史學及其影響〉、〈儒家思想觀照下的中國近代史學觀念〉、〈中國近代史學中的歷史進化史學觀念〉、〈實錄抑或擬真——唐代史家劉知幾對於史學求真的理解與認知〉等十餘篇論文。

## 提 要

中國近百年來史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然而促成此一發展的重要因子，即是史學觀念的演變。構成「史學觀念」的要項有：歷史意識、歷史知識、歷史解釋，三者間有著極為複雜的網絡。因此在中國近代史學觀念中，延伸出三個頗具代表的類型：儒化史觀、進化史觀、實證化史觀，以此三類型做為代表，並不表示中國近代史學觀念中，只能抽離與分析出這三者。無疑的，這是一種「理念型」的呈現。

本文在章節的安排上，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分四個小節，分別為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的形成，文獻回顧與方法以及研究的理論架構與預期成果。第二章「儒化史觀的形成與演變」，首先「儒化史觀」做為傳統史學觀念的一種代表，主要表現在「變易」史學觀和「義理化」史學觀上，變易史觀則可顯現中國傳統史學對時間變化的理解；義理化史觀所具有的倫理化傾向，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特徵之一，這兩種史觀在中國近代史學演進中佔有一席之地，近代諸多史家均隱含了這兩類史學觀念。第三章「進化史觀的引進與影響」，這無疑是受到近代西方「進化論」學說的影響所產生的史學。在「進化」的概念中隱含了「進步」的價值觀，歷史的進程是指向美麗的未來，這和傳統「變易論」中往復循環的美好古代形成強烈對比，可是不論「過去」與「未來」都指向無限的時間，兩種皆線性化的思考，究竟誰是進步／退步呢？第四章「實證化史觀的興起與發揚」，是針對科學化史學觀念的反應，中國近代史學對「科學」的迷戀，演生出對史學實證化的追求，「新考據史學」研究團隊的形成，和視歷史為科學的「馬克思史學」，均陷於科學至上論的泥淖中。第五章則為「結論」。另有附錄三篇，分別為：〈晚清公羊學者的歷史解釋〉、〈德國歷史主義的發展及其對中國近代史學的影響〉、〈蘭克的史學及其影響〉，可作為本書的修正與補充。

整體而言，本書撰寫所關懷的重點，仍是史學如何從傳統過渡到現代其間的流變，透過「史學觀念」建立起解釋的理論架構，來說明中國近代史學是否為新的可能性。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的形成	4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方法	8
第四節 研究的理論架構與預期成果	12
第二章 儒化史觀的形成與演變	19
第一節 儒家對「道」的求索	19
第二節 變易史觀在近代的展現	22
第三節 義理化史觀的近代內涵	38
第三章 進化史觀的引進與影響	59
第一節 進化論的形成與引進	59
第二節 進化論對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影響	70
第三節 進化史觀的具體內涵及表現	76
第四章 實證化史觀的興起與發揚	99
第一節 史學的科學化	99
第二節 考據學的深化	108
第三節 實證化史觀的展開與成績	115
第五章 結論	133
參考書目	139
附錄	159
附錄一 晚清公羊學者的歷史解釋	159
附錄二 德國歷史主義的發展及其對中國近代史學的影響	171
附錄三 蘭克的史學及其影響	179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晚清至民初，雖然在政治上屬於前後兩個不同的時代，但基本上在文化的發展和傳承，卻是一個「連續體」。因此，從清末至民初究竟呈現出什麼樣的歷史圖像呢？這裏借用「圖像」一詞，並非吾人所見的真實歷史圖像文獻，而是在歷史時間長流下，吾人所積累的「歷史記憶」。可是記憶會欺人，雖說只是百來年前的事，在不同世代人中，「史事」卻早已成爲眾說紛云的「流言」。的確，晚清至民初此一波瀾壯闊的歷史圖像，在不同的史家描繪下倒不像是古典的寫實主義，反而像印象派的畫作，充滿了史家主觀的熱情與筆觸。「過往」隨時間的推移宛如「異域」，〔註1〕可是對於史家而言，如何解釋此一「異域」呢？任何歷史解釋都必須賦予時間某種「意義」，這是一種「歷史意識」的呈現。〔註2〕中國近代史學中的歷史意識不同於「傳統的」，可它又滲入了

---

〔註1〕 關於「歷史記憶」諸問題，可參考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年), 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年), 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論集體記憶》(上海: 上海人民, 2002 年)。

〔註2〕 何謂「歷史意識」？根據胡昌智師的定義：「知道人類的社會行爲以及爲共同生活所創建出來的一切制度、器物都和時間有關；它們不是超乎時間，而是在時間之流中的。……歷史意識泛指對一切人事制度所具有的時間意識。」見胡昌智，〈什麼是歷史意識〉，《思與言》，第 21 卷第 1 期，1983 年，頁 2。另見 Jörn Rüsen, “*Making Sense of Time: Towards a Universal Typology of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文，載於《台大歷史學報》(台北: 台大歷史系, 2002 年), 第 29 期, 頁 189~205。余琛 (呂森) 認爲「歷史意識」

多少「現代的」呢？傳統／現代，舊／新，退步／進步等一組組對立對照的觀點，充斥在當時的知識階層中，可又有誰能說清楚講明白自己的史學觀點是不可易的原封呢？「半新不舊」吧！如果真要下個定義的話。

中國近代史是充滿「危機」的歷史，然而危機構成了「歷史意識」。<sup>〔註3〕</sup>梁啟超（1873～1929）將自己的文集取名為《飲冰室》，乃借用《莊子·人間世》中的一句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sup>〔註4〕</sup>梁氏因危機而生的焦慮感，溢於言表。不獨梁氏，晚清以降，為因應此一千年未有之變局，士人間早已激起變革的呼聲，不論是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丑新政，皆為此間危機中的變革。知識階層的「自覺」，首先表現在「存亡的自覺」上，亡國滅種之憂，不斷喚起國人奮起，保種、保教、保國的危機意識，這正是一種「創傷」的表現，一種帶有「災難性」的危機的創傷。<sup>〔註5〕</sup>問題是我們如何克服這種創傷，「歷史化」不失為一種文化的策略，即通過賦予事件某種「歷史的」價值和意義，藉由造成創傷的歷史事件安置在歷史語境之中來彌合創傷，<sup>〔註6〕</sup>不論在歷史的研究中採取何種「歷史化」的方式，都足以說明此一過程

的形成首先來自時間的「體驗」（experience），其次是賦予它某種「維度」（dimensions），在這些維度中，時間和意向（intentions）聯係起來獲得某種「意義」（sense），而此一意義的產生「方式」（modes）可進一步區分，當一個特殊問題產生後，在不同文化的長時段變化時間中，是否仍有一種「發展」（developments）的邏輯存在，最後是人在面對時間變化的原則時，所感覺的「侷限性」（limits）。

〔註3〕 余琛（Jörn Rüsen）在〈危機、創傷與認同〉一文中指出：「歷史建立在一種特定的時間體驗上。它就是對“危機”的回應，即“危機”必須通過解釋來處理。這種觀點也可能從別的方向來理解：如果想要理解歷史思維的某種表徵，我們就必須找到危機，以及它遭遇的“危急的”時間體驗。」見《中國學術》（北京：商務，2002年），第9輯，頁17。

〔註4〕 語見《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上海：上海古籍，2003年），頁5～6。

〔註5〕 同註3，頁18～22。余森認為危機可區分為三種類型，它們構成了歷史感知發生的不同模式。此三種類型為：1.正常的危機（normal crisis），2.危急性的危機（critical crisis），3.災難性的危機（catastrophic crisis）。我以為晚清的歷史圖像正是此一災難性的危機呈現，當它發生時，歷史感知運用的語言陷入沈默，我們喪失了與不同文明文化間對話的可能性，進入了一個整體民族“失語”的開始。

〔註6〕 「歷史化」的具體表現，可從幾項方式來說明，1.隱匿化：將歷史事件裏負面的行為，代之以中性的字辭。2.範疇化：將一些特定的術語融入一種有意義的時間發展中，如「悲劇」一詞的使用。3.正常化：消解所發生事件的破壞性，



是一種消解創傷的文化實踐。

清末民初因時間的急迫性所帶來的壓力，亦在此一圖像中得到充份印證。革命黨人陳天華曾讚歎西方「二三百年來，發明無數」，在技術方面，其「所出的物件神鬼不如，真是巧奪天工，妙參造化……火車、輪船、電燈、電話、電汽車，一切機器極遠的不過百年，極近的不過一二十年，尤其這十年的進步，真不可思議……。」〔註7〕胡昌智分析此段文字後認為：「愈靠近現代，發展的時間單位愈小；這正是對發展之加速進行的表達。……它的使用象徵著陳天華在同時存在的兩種不同發展速度對比之下所產生的內心焦慮。」〔註8〕其實，近代中西間兩種不同歷史時間的對比，是以西方歷史時間做為參照，以西方近代線性化歷史時間來說明世界歷史的進程，本質上時間壓力來自「進步時間」這一概念。清末至民初絕大多數知識階層均接受這個概念，而且認為中國呈現出靜態、非發展的時間印象，形於外的表現，則出現在變革者認定改革必須是急劇而迅速的，故變、變、變，求速變矣！

要勾勒出中國近代歷史的整體圖像，是十分複雜的挑戰，不論從什麼角度切入，都難窺全貌，但這並不表示無法可行，如現代物理學中的「混沌理論」，是一種確定性的非線性動力系統中的一種複雜的隨機行為，這種隨機性並非由外界隨機因素所驅動，而是非線性系統自身固有的。〔註9〕一種亂中求

代之以「人性」或「人類罪惡」的反復性。4.道德化：將歷史的創傷馴化，以記念的形式警惕人們。5.審美化：將創傷性體驗呈現給感知，以嬉笑怒罵的方式，消解令人不安的焦慮。6.目的化：將創傷性的過去與現在的生活形式調和，以避免現實生活重返過去。7.專業化：用一種純學術的方法，使創傷體驗的無意識狀態被控制。8.後現代史學式的反省：極端的論者將使創傷性事件變成如鏡花水月般的虛無縹緲。參見註3，頁32~36。

〔註7〕黃季陸主編，〈民報〉，《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台北：黨史會，1969年），頁0464。

〔註8〕胡昌智，〈時間壓力——「民報」（1905~1908）試讀〉，《台大歷史學報》（台北：台大歷史系，1990），第15期，頁198。這種「內心焦慮」導因於中西間「時間觀」的不同，一種粗淺的看法，過去西方學者總認為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念為一種「往復循環」，因此中國沒有「逝去不復」的時間觀念；另一種看法是大部份中國古代思想家所思考的是具體特殊的事物，故未曾提出「無限超越，永久不變」的概念，關於此一問題可參考陳啓雲，〈中國古代歷史意識中的人與時〉，《開放時代》，第3期，2003年，頁51~66，黃俊傑，〈傳統中國歷史思想中的「時間」與「超時間」概念〉，《現代哲學》，第1期，2002年，頁59~68，以及李約瑟，〈中西時間觀與變化觀的比較〉，《思與言》，第21卷第5期，1984年，頁542~556。

〔註9〕關於「混沌理論」可參考吳自勤等主編，〈混沌：未來世界可預測嗎？〉，《物

序的方式，或許是我們在面對此一階段歷史過程所當有的態度。做為中國近代危機的歷史性創傷，造就了近代歷史意識的出現，然而歷史意識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深受歷史知識的影響，而歷史知識又受到歷史解釋的驅使，使得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形成相互影響的網絡。〔註10〕此一「網絡」構成了「史學觀念」（ideas of historiography），它是一個複數的觀念集合體（complex of ideas），在歷史進程中存在著不同的史學觀念，並影響著人們對歷史闡釋的根本看法。

## 第二節 問題意識的形成

任何一種觀念的產生，有其特定的過程，從經驗（experience）／理解（understanding）／判斷（judgement）／抉擇（decision）／視域（horizon），經過這一連串的變化，當視域形成後，某種觀點也隨之成型。「史學觀念」的形成亦然，從廣義的角度看，「史學觀念」的研究屬於「觀念史」研究整體範疇的一部份，彼此有重疊，卻也有不同的側重。「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它側重單位觀念（unit-ideas）的演變，與傳統「學案式」研究的方法不同。〔註11〕雷家驥在《中古史學觀念史》一書中對「觀念史」的定義為：「余

---

理學與社會學》（新竹：凡異，1994年），頁112～125，葛雷易克（James Gleick），《混沌——不測風雲的背後》（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John Briggs and F. David Peat，《渾沌魔鏡》（台北：牛頓，1993年）。

〔註10〕楊志遠，〈泛歷史認識網絡試論〉，《吳鳳學報》（嘉義：吳鳳技術學院，1999年），頁370～376。另見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88年），頁1～93。

〔註11〕「觀念史」研究的主要學者洛夫喬伊（A. O. Lovejoy, 1873～1962）首創「單位觀念」（unit-ideas），提出觀念可以從歷史時空中分離出來，而無須考量其時代背景與作者意圖，關於洛夫喬伊氏的論點可參考其鉅著 A.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年）的第1章導論。約在20世紀60、70年代，觀念史研究有被邊緣化的傾向，史學界開始批判「觀念史」研究的侷限性，認為它只關注抽象的概念及少數精英的思想，忽略了觀念的社會背景及大眾的思想狀態，繼之而起的是對觀念史研究的修正，如「知識份子史」（history of intellectuals）、「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觀念的社會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都屬於「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的範疇。關於當代西方精神史的研究，可參見孫有中，〈當代西方精神史研究探析〉，《史學理論研究》，第2期，2002年，頁31～37。至於「學案式」的研究特點，

論述史公以後，知幾以前，史學思想觀念與史學發展，蓋由此出發。至於所謂史觀也者，乃指廣義言，凡精神意識、思想觀念諸心靈活動者皆屬之；雖下潛意識，如能從其言行推考以知者，亦在論究之列。」（註12）雷氏的說法擴大了「觀念史」研究的範疇，更傾向於「精神史」研究的方向。一般我們習慣以「某某史觀」來說明人們對歷史整體進程的一個看法，比如說「唯物史觀」、「唯心史觀」或「文化形態史觀」等，但這些都是所謂的「歷史觀」。我們也可以將「史學觀念」簡稱為「史觀」，其涵義卻與「歷史觀」有別。首先歷史觀為一有「目的論」的心靈活動，是一種對世界整體的看法；其次它以一種哲學的觀點去理解歷史，闡明歷史過程中的動力、條件與規律。（註13）有人認為歷史觀即「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但史學觀念不是歷史哲學，因為它並無某種鮮明的目的論，也未尋求某種特定的歷史規律。史學觀念亦不同於思想史或哲學史的研究，某某史學觀是以「觀念本身」在時代的演變做為主軸，旁及同時代產生此觀念的種種背景因素，師承或學派的淵源非主要的關懷重心；思想史或哲學史則著重以人物為中心，探討其思想淵源及師承系統，或求某人、某學派的思想體系，其實這種研究方法仍是走學案、學術史研究的路數。吾人以為「史學觀念」在方法上必須是各學科的整合，某種史學觀念也必然是對某某史學書寫「文本」（text）的闡釋，捨此便無史學，當某某史學觀念形成後，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要消解歷史內、外部（external or internal）的緊張。

要理解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形成與轉化，自然不能忽略近百年來史學研究的轉向。嚴格區分，中國古代學術並無西方近代意義的學科分類，經、史、子、集是圖書分類，而非學術分類。（註14）然而今天我們要回過頭去瞭解，

可參考王明蓀，〈從學術史著作之淵源看學案體裁〉，《中西史學史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歷史系，1986年），頁121~140。另見陳祖武，《中國學案史》（台北：文津，1994年）一書。

（註12）綜觀雷家驥師全書，其為「觀念史」所下之定義，早已超越西方觀念史原初設定的研究範疇，尤其是在某種觀念史形成的背景上著墨甚力。見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學生，1990），頁9。

（註13）王育傑、王伯偉，〈歷史觀的涵義與派別〉，《南開學報》（台中：南開技術學院，1996年），第1期，頁389~404。

（註14）「通家大儒」的觀點影響中國古代學術甚深，章學誠主張「學貴專門」，頗含近代以來學術的風向，但硬要說四部分類合於近代學術分類，恐怕是想當然的思考。無疑的，中國近代學術學科的分類是從西方引進的，其中史學這一門，也是透過西方近代對歷史研究所下的定義來分門別類。汪榮祖先生認為

卻又不免帶有我們所熟知的西方分類法去思考，在這一來一往中，如何去釐清傳統史學與近代西方歷史學間的「差異性」，也只有從此一差異性中才能看出文化多元的可貴性。中西史學的歷程並不是站在同一基點展開的，傳統史學在經歷西方史學的洗禮下，開始蛻變，但這是一廂情願式的輸入，非一種平行式的文化交流。西方近代史學的展開，是對史學中史料的批判開始，其中十九世紀德國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可做為代表，不過蘭克本人並未直接對中國近代史學家產生影響，其影響是間接的，其中介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史學界，而中國近代史學的徹底轉型則晚至 1920~30 年代，當史學逐步學院化、專業化後才得以展開。（註 15）中國近代史學從一開始便不是對西方史學簡單的模倣與移植，它呈現出一種「嫁接」的現象。中國究竟有無「歷史」？或者是說有無「史學」？此類問題的思考在近代不斷反復刺激著史學工作者，不過種種的反思往往深受西方學者的引導，少有從傳統出發做深層的批判，比如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對中國歷史的斷言：「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

近代史學的昌明光大，有三個要素，即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此「三化」是中國近代史學能否成立的關鍵，參見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1985 年），頁 221。另外圍繞在此一命題而進一步深化研究的有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政大史學，1999 年），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北：遠流，2002 年），以及周文攻，〈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北京師大，2002 年）。論文則有黃晏好，〈四部分類是圖書分類而非學術分類〉，《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00 年，頁 104~112，羅志田，〈西方學術分類與民初國學的學科定位〉，《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01 年，頁 75~82。

〔註 15〕關於蘭克的史學可參考汪榮祖，〈回顧近代史學之父蘭克的史學〉，《史學九章》（台北：麥田，2002 年），楊志遠，〈蘭克的史學及其影響〉，《吳鳳學報》，第 11 期，2003 年，頁 35~42。至於西方史學輸入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則參閱杜維運師，〈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聽濤集》（台北：弘文館，1985 年），頁 137~192，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科，1996 年），頁 44~105，鮑紹霖編，〈西方史學東行歷程及其在中國的反響〉，《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2001 年），頁 1~34。

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註16〕黑格爾的說法正是西方史學中心主義至上的代表之一，其它或出於無知；或本身帶有某種偏見，直至20世紀中後期仍維持著黑格爾的一貫論調。事實上，中國不但有歷史，更有令人稱羨的史學（當然這裏指稱的史學，是具有中國傳統史學所包含的事、文、義的意涵），如果回過頭以中國傳統對史學的闡釋來理解西方的史學，不知近代以前西方的史學能否成立？杜維運曾對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所下的評論臚列出八大項原因，〔註17〕其中有厚誣者，有誤解者，凡此種種不能不說是一種憾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這種情況於近年稍有變化，侯格睿（Grant Hardy）在《歷史與理論》發表了一篇名為〈一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能對現代西方理論有所貢獻嗎？——論司馬遷的多重敘事〉的專文，則認為司馬遷特有的歷史觀念，是承認史家和證據的侷限，提出多重解釋的可能，並集中於道德的省察。對西方人而言，這種混合體是陌生的，但卻又清楚的描繪出司馬遷史學方法論的圖景，並且提供了某些企求逃避傳統史學著作模式的現代歷史學者，一個可能關注的樣本。〔註18〕類似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在面對西方史學時的反思。

〔註16〕黑格爾，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頁123。

〔註17〕見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台北：東大，1981年），頁47~50。這八項分別為：1.認為產生史學最基本的重視歷史的態度與觀念為西方文化所獨有，而中國則極度缺乏，差不多是一致的論調。2.中國史學的發展，永遠沒有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最後障礙——希望窺探往事的真相，永遠沒有發展批判史學，永遠沒有意思視歷史為客觀的瞭解。3.中國的考據學沒有到達西方的境界，未能對證據作科學的評價與分析；中國歷史永遠沒有發展自我批評與發現的方法，無情的考驗通則，有目的的覓求文獻以證明假設。4.中國史學未能到達西方「綜合」的境界，也沒有發展歷史解釋的藝術。5.中國有「一切確定」的觀念，相信凡屬歷史記載，皆完全客觀。6.中國的修史制度，太官方化；中國歷史太有特徵被稱為「資治歷史」。7.中國史學精細，中國史學重視文獻，中國歷史資料浩繁。8.中國史學與歐洲1450至1750年間史學，蓋在伯仲之間。另見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台北：麥田，2002年），頁136~161。

〔註18〕Grand Hardy, "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The multiple narratives of Ssu-Ma Chie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3, no.1, 1994, pp.20~38。侯格睿氏在另外一篇名為〈文本中的世界：司馬遷的「史記」〉的文章中提到「西方讀者看來，《史記》可能像一部沒有完成、未經整理、有點失控的史書；司馬遷似乎像一個沒有頭腦的抄寫者，它不加區別地亂抄寫、自相矛盾，缺少編修史書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控制力的感覺。」（見該書頁99）汪榮祖先生在〈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引文中省略了「可能」二字（見該書頁153），如此一來侯格睿氏似乎並不認同司馬遷的史學，然而前文所論卻非如此，不知是否為「誤讀」？我比較傾向侯格

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形成是一種中西雜揉的呈現，在不同的史家身上會有不同的比重，另外在時間的跨度上，時間愈後，西方史學的影響便愈深，但傳統史學並未因此消亡，反而出現一種新形態的表敘方法。如果說傳統史學是一種「史官史學」，那近代則是「史家史學」，史學書寫過程中官方色彩趨淡，逐步邁向史學「獨立化」的理想。我以為中國近代史學觀念中有三大觀念必須提及，首先是儒家化的史學觀念；其次是進化論的史學觀念；最後是實證化的史學觀念，此三大史學觀念在時間上有先後，但在觀念的呈現上卻是重疊的，不論是「儒化史觀」、「進化史觀」、「實證化史觀」，都有前者位於不同時間進程的殘留，似乎沒有一種全新概念的轉變，反而是一種自傳統出發的「創造性轉化」。以「史學觀念」做為此一時期，研究命題的論文，並不多見。較多的論文多集中在「史學現代化」的議題上，如 1999 年出版陳以愛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一書，主要是從史學專業化的角度切入，來說明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另一本在 2002 年出版的專著，劉龍心的《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則側重於史學學院化及職業化的影響。北京師範大學周文玖的《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一書，更進一步深化專業化史學的內部分支學科「史學史」的建立。這三本專著有著共同的特點，即皆從近代史學的「制度面」來掌握史學的發展，偏向史學的外部結構說明與分析，我以為這個方向與視角是正確的，但不免有些遺憾，畢竟史學的核心是史家、史學與時代的互動，何者能代表並凸顯此一互動過程呢？當然是貫穿時代的「史學觀念」，故有本文之作。

###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方法

本文在時間的跨度上，基本以鴉片戰爭起，迄於 1930 年，做為時間下限的二十世紀 30 年代是中國近代史學轉變可能的「思考點」。我基於三個理由，首先是各大學史學系及研究院所的普遍設置；〔註 19〕其次是史學學會的設立及各

---

審氏對司馬遷的理解，即不能以西方的史學來界定司馬遷的史學觀點。侯格審氏的文章收錄在魏格林、施耐德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台北：稻香，1999 年），頁 85~112。

〔註 19〕 1913 年 1 月教育部公佈的《大學規程》，確定了文科分哲學、文學、歷史學和地理學四門，其中歷史學門分設中國史及東洋史、西洋史二類。1917 年北京

類史學期刊的刊行；〔註20〕最後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註21〕葛兆光認為1929年是一個斷限，其主要論點有二：一是西方歷史學理論和方法於此時早已大量引入中國，史家所關注的領域已經從漢族擴展到四裔或世界；一是在歷史學界對「新史學」的界說。〔註22〕我認為不論是1929年，或是1930年，似乎可以視為史學發展的「轉折點」。前一節曾提到以「史學觀念」做為研究主題的論文並不多見，即使有冠以「史學觀念」的論文，其對「史學觀念」

大學校長蔡元培在文科學門中，增設了中國史學門，並開設中國通史、歷史學原理，民族史、宗教史、法制史等課程，此外清華大學史學系、燕京大學歷史系，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河南大學歷史系均有開設類似的課程。1921年，北京大學成立了研究所國學門，並招研究生，1925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設立，1928年，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1931年，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1932年，北京大學研究院，1935年，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這一波研究院所的設置對中國近代史學專業人才的培育有著深遠的影響。參閱胡逢祥，〈中國現代史學的制度建設及其運作〉，《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2004年，頁66~72，秦兵，〈教學需求與學風轉變——近代大學史學教育的社會科學化〉，《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2001年，頁169~180。

〔註20〕 秦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第5期，2004年，頁116~139。該文分析認為史界雖多次嘗試以學會組織的形成，來帶動史學研究，但與其它學科相比，史學會在組織的穩固與影響程度上都顯遜色，其中史學界的「派分（派系）」難以協調，是最主要的因素。至於史學學術期刊的出現，1920年有《史地叢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史地學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1926年《史學與地學》（中國史地學會），1929年《史學雜誌》（南京中國史學會）《史學年報》（燕京大學史學年），《成大史學雜誌》（成都大學史學研究會），此外如《國學季刊》（北京大學，1923年），《清華學報》（清華學校，192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9年）都享有較高的學術聲譽。這一時期史學學術期刊的變化可參見張越、葉建，〈近代學術期刊的出現與史學的變化〉，《史學史研究》，第3期，2002年，頁57~63，李春雷，〈史學期刊與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型——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例〉，《史學理論研究》，第1期，2005年，頁97~109。

〔註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28年10月22日成立，其所標示的意義，不單是中國近代史學「職業化」的群體出現，而且關係著國家／社會權力兩者間的互動，在治史的方法上首創學科的整合，並利用新技術及新工具在歷史的研究。關於中研院的設立及與國家的互動可參考陳時偉，〈中央研究院與中國近代學術體制的職業化（1927~1937）〉（北京：商務，2003年），《中國學術》，第15輯，頁173~213。另有三篇回顧省思的論文，杜正勝，〈舊傳統與新典範〉，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邢義田，〈變與不變〉，均收錄在《當代》（台北：當代雜誌，2004、4年），頁24~69。

〔註22〕 葛兆光，〈「新史學」之後——1929年的中國歷史學界〉，《歷史研究》，第1期，2003年，頁82~97。

的定義，與我的定義並不契合，故只有割捨，但對於史學發展的通論性文章和專著則為數甚多，如顧頡剛（1893～1980）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雖是通論性的編著，卻對 20 世紀前半中國史學的研究提供相當程度的看法。〔註 23〕劉龍心，〈七十年來對於「現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回顧與評析（1902～1949）〉一文，可以說是比較全面的分析了近代以來史學的流變。〔註 24〕此外朱仲玉〈中國史學史書錄〉，〈中國史學史書錄續篇〉兩篇文章則評介了自 30 年代起較有影響力的中國史學史講義、史學通論、史學概要等書，以及 80 年代以來以「史學史」為書名的 16 種著作。〔註 25〕晚近則有羅志田主編的《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下）》，則為史學不同專業領域的合作，〔註 26〕以及吳懷祺主編多卷本的《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其中陳鵬鳴的《近代前卷（1840～1919）》，及洪認清的《近代後卷（1919～1949）》，在書寫的方式則採傳統思想史的寫作形式。〔註 27〕許冠三所著《新史學九十年，1900～》（上、下），是一部令人激賞的評論性著作，自梁啟超起，「新史學」諸家的史學流變，皆能娓娓敘述分明。〔註 28〕至於個別史家較近的研究如唐小兵對梁啟超史學的研究，《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一書，則圍繞在梁氏闡揚民族主義的現代文明論述和其歷史思考這兩個主題上。〔註 29〕王汎森對傅斯年的研究，《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都突破了前人的理解而有新意。〔註 30〕

本文欲分析的史家，除前述的梁啟超，傅斯年外，還有夏曾佑、嚴復、

〔註 2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未印出版年）。

〔註 24〕 劉龍心，〈七十年來對於「現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回顧與評析（1902～1949）〉，《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台北：國史館，1998 年），第 1 冊，頁 1～37。

〔註 25〕 朱仲玉，〈中國史學史書錄〉，《史學史研究》，第 2 期，1981 年，頁 62～67；〈中國史學史書錄續篇〉，《史學史研究》，第 4 期，1997 年，頁 21～28。

〔註 26〕 羅志田主編，《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上、下）》（濟南：山東人民，2001 年）。

〔註 27〕 吳懷祺主編、陳鵬鳴，《中國史學思想通史——近代前卷（1840～1919）》（合肥：黃山書社，2002 年），洪認清，《中國史學思想通史——近代後卷（1919～1949）》（合肥：黃山書社，2002 年）。

〔註 28〕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1900～》（香港：中文大學，1989 年）。

〔註 29〕 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

〔註 30〕 Wang Fan-Sen, *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章太炎、劉師培、顧頡剛和胡適，其它論及的尚有龔自珍、魏源、王韜、王國維。在文獻資料的運用上，主要以前述諸學者的主要史著和相關的史學文章，做為主要分析的脈絡，並參考晚近諸學人對個別史家的研究成果。在方法的運用上，則採用一種「倒放電影」(regressive method)的方式，〔註31〕從已知的結局，回溯過往，企圖發現過去研究者或當事人未能注意的事項，尤其是在對立觀點下被迫放棄自身觀點的「失語人」。任何的史學研究均有方法上的運用，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一書，例舉史學常用的幾種方法，如歸納法、比較法、綜合法、分析法，〔註32〕但不論是那一種史學方法，都只是運用史料，辨別史實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探究「歷史事實」的真實性。然而吾人在面對浩瀚如海的史料時，如何解釋？在西方詮釋學的影響下，「歷史解釋」很難達到我們所要追求的「客觀性」，沒有了客觀性，歷史的真實性是否仍能存否？在當前諸多的理論中，伽達默耳（高達美 Hans-George Gadamer, 1900~2002）所提出的「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 / effective-history)可說明此一現象。何謂「效果歷史」，即在解釋學（詮釋學）中，認為理解具有一定的「歷史的有效性」，歷史研究的對象既非主體；亦非客體，而是兩者相統一。人類在面對歷史時，最難克服的便是「時間間距」(Zeitenabstand / temporal distance)，它包含了過去、現在與未來，此一時間性的距離，成為我們理解古代文物或文獻的障礙，要克服便要採用一種「視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 fusion of horizons)的方式，將過去與現在，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均融為一體，並構成一無限的統一整體，如此歷史就在視界不斷運動和相互融合中成為「效果歷史」。〔註33〕其實伽達默耳對方法論解釋學把「理解」作為重建文本的原意是反對的，他認為文本的意義並不是客觀的存在，文本的意義是不斷生成的而非重建的，所以「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人」則居於來自傳統的「成見」(Vorurteil / prejudice)之中，〔註34〕理解者和文本都各有其自己的「成見」，即「視域」，文本的意義就在

〔註31〕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第4期，2003年，頁182~184。

〔註32〕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1999年），頁67~139。

〔註33〕關於此一說法，可見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上海：上海譯文，1999年），頁385~394。另可參考嚴平，《高達美》（台北：東大，1997年），頁125~150，陳榮華，《葛達瑪詮釋學與中國哲學的詮釋》（台北：明文，1998年），頁91~144。

〔註34〕這裏所謂的「成見」(vorurteil)並非負面含義的「偏見」，而是高達美認為人